



金融研究简报

第二十四期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2014年4月11日

如何打造“生态新型城镇化”

4月10日，在博鳌亚洲论坛“亚洲的新未来，寻找和释放新的发展动力”分论坛“生态·新型城镇化”上，与会专家就认清水资源危机、保护治理水资源环境、打造新型城镇化以及如何在环保中利用金融杠杆的资源配置作用展开了讨论。

数据显示，中国已是世界上环境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王文认为，生态金融大有可为。中国梦的基石，不只是财富与收入，还应是生活环境的完善与优化。要以金融家的睿智与巧劲，将政府、企业、民众的积极性彻底激发出来，合力打赢一场艰巨的“环境保卫战”。

水危机真的离我们很近吗？

马蔚华（招商银行前行长、永隆银行董事长）：我最早认识到这个问题是通过央视的广告——“世界最后一滴水是我们的眼泪”。我之前到碧水源做了一次调查，听其董事长讲北京市和中国水的状况时得知北京的水都不能喝了，这说明中国 30 多年的发展造就了在世界上的崛起，也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水到今天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污染，其中污水的随意排放、对水的消耗缺少规划、制度甚至法律保障等都是水污染问题的重要原因，而中国文化认为“水可以信手拈来，经济发展更重要”更是成为不珍惜水资源的借口。

王浩（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资源所名誉所长）：从基本的自然禀赋看，中国水的条件在世界各国中比较差，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均水资源占有量比较少。世界上 192 个有水统计的国家里，从高到低，中国人均占有的水资源量是第 127 位。中国的海河流域，即京津冀地区的水问题较突出；第二，中国水资源的分布南北不均衡。中国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人口 GDP 和灌溉面积差不多占了全国一半，但水是全国的 81%，而北方六个一级流域（淮河、海河、辽河、松花江及内陆河等）只占了 19% 的水资源；第三，中国是大陆季风气候，降雨很集中。假设伦敦、巴黎、哈尔滨和北京这 4 个城市的年降雨量都是 580 毫米，但伦敦和巴黎是海洋性气候，12 个月的降水量是一道平线，哈尔滨和北京 20 天的降雨就占了全年的一半，所以下雨的时候往往是暴雨洪水、城市内涝，雨停以后河道干涸、湿地萎缩。综上所述，中国水资源的先天禀赋对中国不太有利。

此外，中国人口多，70% 的人口又集中在 12% 的东部平原上，所以人口密集、高度城市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发展速度过快造成了环境污染、水源污染问题。全国 30 万公里河长分成 4500 个水功能区，这 4500 个水功能区只有 46% 达到了标准，剩下的 54% 都不达标。

何巧(北京东方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地表水70%是脏的,但这些水要浇灌庄稼,北京市地表水58%被污染,但北京300万亩农田需要灌溉,所以粮食受污染比例比较大。我们有约1.5亿亩的耕地受污染,也即饭桌上有10%的食物是污染的土地里生产出来的。

朱民阳(扬州市市长):这几年从扬州来讲,扬州是一个因水而生的城市,6400平方公里面积中三分之一是水。尽管这几年扬州的水资源保护工作做得还不错,但城区还有10条65类的水。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如何把水保护、水治理做为发展措施考虑进去,此外,从改进人们的生活不良习惯来减少生活污水这一块。政府以水治理来倒逼产业结构调整,倒逼人口素质的提升,这是我们对治水、生态环境的基本考虑。环境污染是政府和企业的负债,有些效益产生了,利润实现了,但是如果我们在治水的问题上、在环境保护上这些东西没做,这个利润是不完整的,这个成本我们现在是要付出的。政府怎么治理?这是一个很大的系统工程,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需要系统工程真正要把水治好,比如我们现在有一个投资100亿的清水河水的工程计划;还有就是提倡市民保护水、珍惜水的意识,这跟每个人都有关系。

新型城镇化是一把双刃剑

王如松(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第一,环境为体,水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城镇存在与发展脱离不了水。我们所谓的生态是包括人在内的生物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包括我们和水、大地、能源、大气以及我们排出的废弃物有关,这就是所谓环境为体;第二,经济为用,我们通过生产、消费使城市具有活力,使城市化给人带来福祉。第三,城市以人为本,有人口、人治、人文、人心、人气,这些结合在一起才是人和环境之间的耦合关系。无论北京2012年“7·21”水灾,还是平常

的严重雾霾，都不是一个单纯的污染问题，都和北京水资源的匮乏有关。

新型城镇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新型城镇化使人民生活水平改善，解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它挽救了世界经济；另一方面，城镇化的负面不言而喻，水污染、灰霾、土壤污染等一系列环境问题给我们带来严峻挑战。今天（4月10日）北京雾霾PM2.5是500多，是不是把污染源和电厂、重大污染的工厂关闭搬迁就可以了呢？不是，首先应该是环境问责的问题。责任方包括政府、企业、社会。政府这次在全国人大十二届会议上也提了一些议案，有关部门要思考究竟我们现在的环管理做得怎么样了？比如京津冀地区现在集中了28个欧盟国家所有的钢铁产量，4000万吨的燃煤，7000公里的高速公路，2400万辆车等，所有项目加起来远远超过环境容量。当年是谁批的项目？另外，每一个环评是怎么通过的？国家相关环保部门，项目批准部门是不是应该有一定的责任？地方政府是不是应该有责任？这是体制机制的问题。包括现在的环评，我们现在有的环评单位环评完以后无可奈何，虽然规定了什么条件下项目是可行的，但项目通过后谁来考核、检查这些条件是否达到了？这些都没有落实的具体措施。

所以我建议应该把市场机制启动起来，政府、企业、市场和社会，成立生态监管，就像每个楼盘都有一个物业管理公司。我们的生态、水、土壤、气、生物，废弃物没有公司管，国家政府可以出台政策，收生态税，每个单位管一定的土地，生态的主要指标由生态物业管理公司监测和审计，根据你对于生态资源占用的多少来决定给你惩罚还是奖励，这样有监管的单位每年进行审计，才能冤有头、债有主。

祝利明（中房联合集团执行总裁）：我们企业对生态新型城镇化建设用三句话形容：第一，生态优先。我们在生态水资源特别好的地方建设生态新城该如何保护水？我们在水污染特别严重的地方打造新型城镇化该如何治理水问题？在打造新型城镇化过程当中，不是纯粹做一个房地产，而是将产业导入城镇化建设。

生态新型城镇要靠文化支撑。最近新型城镇化建设当中提到以人为本，中间的核心问题就是靠文化支撑，因为目前生态示范区开发过程当中，文化是灵魂，生态是核心，产业是主导方向。

我们做类似于生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时候都有共性，无论在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都是和政府共建。如何解决资金问题？企业和政府合作的产业如何定位？这些都非常重要。此外，新型城镇化过程当中有产业，但我们不是通过土地、通过开发、通过向政府要政策去获取利益，更多的是通过产业链运营，通过到资本市场获利。未来可能等养神、养心、养老等健康产业形成规模以后就可以进入资本市场获取利益。

王浩：打造新型城镇化里分几个层次：1、解决水安全的问题，把防洪、供水搞好；2、解决水环境的问题，把水质、水环境治理好；3、解决水生态问题，水生态系统健康，使其有洄游性鱼类；4、打造水景观，亲水的环境让市民有休闲游憩的场所；5、发展水文化，因为城市的河流是这个地方文化的积淀地，古代的清明上河图都反映了这个情况；6、水文化搞好以后就是水产业，把城市滨河两岸造成城市的产业高地，如巴黎塞纳河两岸就是巴黎城市的一张名片，1991年授予联合国文化遗产的称号。所以水治理、水生态文明是新型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新型城镇化首先是对过去的反思，过去的城镇化往往是摊大饼，城市无限的扩张，新型城镇化在空间、体系有中心区、副中心区，散开一点，不在一点上把城市承载力、生态容量、水容量用得过度，这是空间布局。另外建筑是节能环保的建筑，交通体系是立体、低碳的交通体系，同时更重要的就是城市不能离开水，世界上有名的城市、好的城市都是有水系的。中国也是，前100个城市都是滨河、滨湖、滨江的城市，所以水给了城市灵气，水生态城市或新型生态城市水系的治理也很重要。水系治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包括水安全、水环境、水生态、水景观、水文化、水产业、水经济，涉及到多个政府部门，涉及到前期的咨询、规划、设计、施工、运营管理，这种综

合性的事情中国现在还没有一个合适的形式，还在探索。这方面东方园林走出了一条比较好的路子，最近这5年、10年发展得很好。从顶层咨询、设计一直到最后的施工、一体化运营，东方园林把原本属于政府管的（如园林局管的园林、管绿化，水利局管的防洪、供水，国土资源部管的地下水，交通局管的蜿蜒河道两岸的交通，发改委管的滨河产业）的事情给了一个统一的解决之道，这方面让我十分佩服。

生态金融业大有可为

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根据美国几所著名研究机构联合推出的环境表现指数（EPI）来看，中国已是世界上环境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所排列的世界132个主要国家与地区，中国环境表现综合排名为116，在空气质量上的排名更达128位。制约环保资金投入的重要因素在于，由于中国区域发展水平不平衡，各地政府治理环境的投入能力受其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加之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分配不均，各级政府作为环境治理的主体在财政分配上处于弱势。拓展环境治理项目的融资渠道是急需解决的难题。行政改革与来自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环保双层重视是关键，但另一方面，调动社会与企业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将社会资金吸纳到环境保护中去，也是一种可行性的方案。

马蔚华：美国证监会规定，上市公司如果对水污染、环境污染有责任，就别想上市。我建议中国证监会应该把这个作为（公司上市）第一条（规定）。第二，绿色股票营造绿色市场，如英国、欧盟都为了环境治理发过专门债券。基金公司也可以为水建立绿色基金，保险公司建立绿色保险，如英国、瑞典很多西方国家规定，企业如果对环境有污染必须要上保险，保险对企业来说就是先把污染代价付了，如果治理好了将来损失少，如果治理不好保费就贡

献给治理了。国外经验表明，国际上绿色基金投的项目比一般基金投的项目收益率要高。将来我们可以设立水治理基金，有一个比一般基金回报高的项目，国内国外都能认购。此外，现在有碳排放交易所，水也可以仿照，用水按指标来，用的多的像用的少的买指标。讲到钱的问题，钱的来源很多，一是来自企业，在安排预算里一定要把保护水源、保护环境的预算拿出来；二是来自政府，政府可以征收生态税。现在我们在研究城镇化的资金来源，也通过地方税征收一部分这方面的税，作为政府纳入专项预算，政府只能从这个角度筹资。此外通过资本市场，在资本市场发绿色债券、基金。（保护治理水资源）也要恩威并重。对于污染水的行为要惩罚，同时对于真诚支持保护水资源的要有一些优惠政策，比如政策鼓励商业银行给环保做得好的小企业存贷款时更多优惠，这样商业银行也会有更多的积极性来参与环境保护；此外鼓励那些把水治理做得好的企业，同等条件能够优先上市，这不是对整个社会都是鼓励吗？

朱民阳：有成语叫“九龙治水”，很多事情一定要综合、系统的推动这项工作。这告诉我们，市场的手要用够，政府的手也要用好，这两个是关键。所谓市场的手要用够，主要就是不能就治水而治水，应该要把整个城市的各种公共服务需要和治理城市运转的各种要素，能让市场解决的就要让市场解决，市场看不准的政府果断进入，应该政府投的，政府必须投到位。第二，政府的手要用好，现在地方部门设置许多部门都在管（水资源保护和治理问题），但也都不管。我们正在进行行政制度改革，最终会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把这些部门整在一起，成立专门的生态办、清水办。

王文：根据发达国家的环保经验，环保决不是只投入不产出的行业，更不是只亏不赚的产业。建立市场化的环保投资体制，吸纳私人资本进行环保投资，做大做强环境保护产业，本身就是一项既利国又利民、既发展又生态

的事业。尤其是当前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大潮中，要真正治理好环境，更不能只靠行政手段，而是要多利用金融杠杆的资源配置作用，充分调动市场能力，发挥社会力量。

从政策角度看，可让央行牵头，参照铁路发展基金的模式，发行生态建设债券与生态基金，建立民间的环保生态银行，以互联网金融的模式探索生态领域的众筹、私募等模式，解决目前所面临的资金瓶颈难题，从顶层设计的高度构筑生态建设的金融改革方案与制度框架。从国际角度看，可引入发达国家更多的成功经验，比如，清洁发展机制 CDM 项目、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IFC）的节能减排项目、德国法兰克福等的环保银行。中国也可以尝试推行诸如全球中国生态基金等，吸引更多的国外有识之士与产业为中国环保做贡献。从民间角度看，可大力发展民间公益生态金融业，鼓励企业家捐资，创新生态金融服务，立足于保证生态金融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为新型城镇化的生态建设资金流动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